

距今四千年前的尧舜时代，善卷出现在湖南的武陵地区，他具有那么高的“德行达智”，尧要向他请教，舜要让天下于他，这样一个人物是武陵当地土生土长的么？从当时武陵的社会人文发展水平来看，似乎还不具备诞生这么一位人物的客观条件。从古代文献材料中，从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口头传说中也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当时的武陵已具备了诞生善卷这样一个人物的社会人文环境条件。当然，说善卷在当地成长起来的也不是全然不对，或许善卷的前辈已在武陵生活了好几代。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弄清谁是善卷的前辈？善卷的前辈是从哪里来的？孕育了善卷的是什么样的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又是如何形成的？等等。经过我们对善卷与蚩尤两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善卷不是凌空蹈虚毫无来由地突然出现在武陵，他居住在蚩尤遗族活动的武陵地区，他居住在有着蚩尤祭坛的枉人山上，

湖南大学出版社

刘范弟 著

SHANJUAN CHIYOU YU WULING

SHANGGU SHIQI YIDUAN YISHI DE POJIE

善卷、蚩尤

——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

与武陵



不是偶然的，他或许是蚩尤祭坛和陵墓的守护者。如此看来，他的行事和性格与蚩尤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性，这也就毫不奇怪的了。然而，我们还是把他看成是蚩尤遗三苗部族的一位首领或精神领袖或许更为合适，因为一个祭坛或陵墓的守护者似乎可能与其守护的对象有着这么多的一致性，只有身份地位相接近的人才会有如此多一致的相似性。从蚩尤到善卷，从九黎部族集团到三苗部族集团，虽然已经时移易，尧舜时代的三苗已无法与黄帝时代的蚩尤部族集团相比，他们的实力已大大弱，他们被迫一退再退，从黄河下游地区到洞庭彭蠡之间平原又到武陵山区，其生存空间已大不如前。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原来勇猛威武、威风凛凛、敢与炎黄争锋的英雄蚩尤，最后被迫退避柔弱、微然出世，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的隐士善卷所取代；从蚩尤的“威震天下”到善卷的“莫知其所”，这该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和变化。这一变化反映的正是从蚩尤之“九黎”到善卷之“三苗”的部族命运，也反映了从蚩尤到善卷的民族精神的变迁。尽管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艰辛痛苦，但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仍一脉相承地被继承和发扬着，这从蚩尤和善卷二人各方面的极其令人寻味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中可以看出，这就是不受羁绊、追求自由的精神所在。

K281.6/3

湖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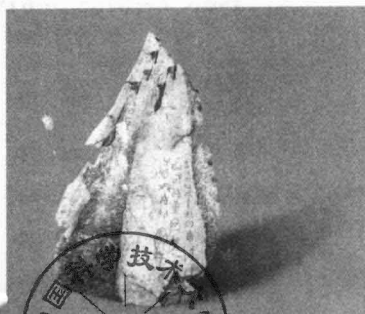
刘范弟 著

SHANJUAN CHIYOU YU WULING

SHANGGU SHIQI YIDUAN YISHI DE POJIE

善卷、蚩尤

——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



武陵

ADA 61/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刘范弟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

ISBN 7-81053-618-4

I. 善... II 刘... III. 苗族—上古史—研究—湖南省 IV. 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900 号

善卷、蚩尤与武陵

——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

刘范弟 著

-
- | | | |
|-------------------------------|-----------------|--------------|
| ☐ 责任编辑 | 肖立生 | |
| ☐ 装帧设计 | 吴丽辉 | |
| ☐ 出版发行 | 湖南大学出版社 | |
| |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 邮码 410082 |
| | 电话 0731-8821691 | 0731-8821593 |
| ☐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 |
| ☐ 印 装 | 湖南大学印刷厂 | |
-

- | | | | | | |
|-----------------------------|-------------------------|--|---|-----------------------------|-------|
| ☐ 开本 | 850×1168 32 开 | ☐ 印张 | 9 | ☐ 字数 | 210 千 |
| ☐ 版次 |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 ☐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印数 | 1—1 000 册 | | | | |
| ☐ 书号 | ISBN 7-81053-618-4/K·13 | | | | |
| ☐ 定价 | 18.00 元 | | | | |
-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一

万 里

我开始治学时，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子，先从文字、音韵、训诂、文献、目录、考据之学入手，始攻历史，后转向思想史。在当时，“古史辨”派的诸家著作，只要能够寻觅得到的，我都要找来阅读，而且是仔细地读。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或结论，但其严谨缜密的学风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确实使人获益匪浅。在随后的科研工作中，因种种原因，我所进行的某些课题研究，也涉及对上古史的考索。例如，早年我在研究中国医药学史时，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及上古医学的发展情况，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1986年，为配合湖南株洲炎陵县（当时称“酃县”）炎帝陵的修复，受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省长刘正老的委托，也主持编撰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关于炎帝神农氏的论文资料集，几乎将现存有关古籍资料收罗殆尽；近年来，为配合湖南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又应邀与同院几位老一辈学者一道参与了对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舜帝文化的研究。研究中，虽然对现存文献资料的检索阅读并无困难，但总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感觉。原因即在于，现存有关古史的可信资料，不是既少且杂、信伪相参、自相矛盾并零星散布于浩瀚的书海中，就是经过后人的多番加工从而失去了某种可信度，要将其辨伪考信并串连拼缀成一较

为系统而又能够成立的信史，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术界已经成书的古史研究著作我也读过一些，总的感觉是精品力作少而敷衍拼凑者多，某些著作甚至将晚出之家谱族谱中托古张扬的记载也作为远古的信史而不加辨析地直接采用，虽成连篇累牍之皇皇巨著，但门外人看了真热闹，门内人看了却知道是在胡闹。基于此，我总是将古史考辨及古史人物研究视为学术研究之畏途，认为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敢贸然涉足。现在，一部《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的古史研究著作摆在自己的面前，却使我相信事在人为实是颠扑不破之真理。

该书的作者范弟先生是我的师兄。我们虽然早就相互知道对方，但面对面的相识却是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二十届年会上。我们同住一房，朝夕相处，在沿着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明代靖江王王府城墙上的多次散步时，范弟兄向我谈起了他对上古史的研究，其中就有关于对善卷与蚩尤的研究。说来惭愧，我虽然生长在湖南，也因主编《湖湘文化大辞典》而对湖湘文化及湖南的历史人物有所了解，但对善卷其人却印象不深，故交谈中听得多而谈得少，然而范弟兄引人入胜的侃侃而谈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找来了他所撰写的《善卷传说及其与蚩尤的关系考论》一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拜读。这是我了解善卷的开始，也是通过阅读而了解范弟兄学识水平的开始。正是有着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和细致缜密的分析思辨力，才使得范弟兄能够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披沙拣金、游刃有余，在我辈视之为畏途的学术领域里披荆斩棘，最终撰写出面前这部足以填补学术空白的力作。

说起蚩尤，许多人并不陌生，他（它）不就是那个在远古

时期的神话传说有着“兄弟八十一人，并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行天下”（《史记》张守节《正义》注引《龙鱼河图》）、暴乱天下而被黄帝擒杀的大怪物吗？即使是学界中人，所了解的史实也大致如此，或者说仅仅满足于了解如此，只不过知道他是“不用帝命”（《史记·五帝本纪》）而在“涿鹿之战”中被黄帝击败的三苗首领，而且此战被“看作是正义战胜邪恶，是仁德战胜暴虐，是受命天子对作乱臣民的‘征讨’‘平乱’”（引文见范弟先生本书，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同此）。至于善卷，人们也仅仅知道他是一位籍贯不明的武陵隐者，其事迹也只是曾经被尧“尊之为师”、被“舜以天下让”。然而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将蚩尤与善卷两个人物作了极为详尽的个案考索研究，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将其置于远古时期中华民族中各个部族集团纷争融合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以这两个人物为主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上古时期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各部族集团先民们的生存史与斗争史的宏伟画卷，建构起一极为清晰的从远古直至近古之九黎——三苗——苗蛮——苗族的发生、形成、发展和迁徙史，并且肯定了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书中精辟的论述比比皆是，叫人目不暇接。

例如：针对前述关于蚩尤的偏见谬说，书中通过严密的文献考证（例如以关于“‘陵’的含义与蚩尤之身份”的考证来论证“蚩尤与炎帝、黄帝一样，都是我国上古时代部族集团的首领，是所谓的‘古天子’”；以《庄子·盗跖》中所云当时人们“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改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的记载来论证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双方均无所谓“正义”说，等等）后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封建正统观念和‘胜者

为王，败者为寇’的庸俗历史观的表现。”黄帝、炎帝与蚩尤都是在“华夏的大地上”同时并存的、“平起平坐”的三大部族联盟集团的首领。然而无论在古籍记载中，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蚩尤不仅不是一位“失败的英雄”，甚至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蚩尤形象的边缘化与妖魔化，是在儒家所建构的华夏正统传承世系构架下，以及在庸俗历史观的潜意识驱使下积淀而成的。作者指出：“在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炎帝与蚩尤“这三大部族联盟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军事民主制度，他们为了扩展生存空间和掠夺人口及财富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因为在那个时代，‘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光荣的事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何况这种战争本身还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的迈进，从而成为阶级、民族、国家产生的一种催化剂和推动力。”这一论述表明，作者不但具有深厚扎实的文献学功底，更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问题。正是如此，我相信作者随后的论述也能够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当时蚩尤一方加盟部落众多，力量较为强大；同时蚩尤部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比较高，武器亦较为先进。”所谓“‘兄弟八十一人’，当指八十一个部落”；所谓“食沙石子”，正“是开采矿石的曲折反映”，“蚩尤带领苗民上山挖铜矿，冶炼铸造生产工具和武器。苗民们用铜工具生产，用铜武器防范敌人侵犯”，这就印证了《尸子》卷下明确指出的：“造冶者，蚩尤也。”从而确立了蚩尤在中华民族冶金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所谓“‘作兵杖刀戟大弩，威行天下’，看来，蚩尤军队已装备了当时种类齐全的最先进的杖、刀、戟、

大弩等金属兵器和远程兵器，这些都是属于进攻型的兵器；从防御性装备来看，蚩尤的将士们的配备也很先进。《龙鱼河图》所说的‘铜头铁额’，实际上就是头盔甲冑之类。在近五千年前的上古时代，蚩尤军队达到了如此的装备水平，这并不奇怪。”正由于“蚩尤军队的装备水平、战争手段和战争艺术都是比较高明的”，故其在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的战争中，展现出极为强大的战斗力，从而哪怕在最终失败后，他还被自黄帝起的历代帝王作为“战神”来祭祀。“总之，蚩尤在我国古代科技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值得重视的，他在我国科技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蚩尤是我国古代冶金业的第一人，是我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第一人，是我国古代天文气象事业的第一人；蚩尤在我国古代科技的这几个重要领域，贡献甚大，其功甚伟；我们甚至可以说，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蚩尤是一个新时代的代表：以蚩尤的‘造冶’为标志，宣告了我国古代社会从石器时代跨入了金属时代。蚩尤是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一位开创者，这样的评价，蚩尤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几千年来蚩尤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却没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价。孔子一句‘何器之能作？’（《大戴礼记·用兵》）就将蚩尤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一笔抹杀了。即使承认蚩尤曾‘冶金作兵’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事，反而将其看作是‘凶’、‘乱’之源。所以就连司马迁这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在他的《史记》中对蚩尤在科技上的贡献也不着一笔。”“这种现象应与我国自尧舜以后以农业立国的文化传统有关。我国从尧舜以后长期处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之中，重农轻工、重农轻商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对于在农业上作出过贡献的先人，人们念念不忘，长久加以纪念。如炎帝神农氏，因其‘教民稼穡’之功，人们

一直把他与黄帝一起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蚩尤，作为我国古代工业的一位开创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重农传统的民族的一种悲哀。在世界已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今天，我们对此进行反思，或许还是不无启发和教益的。”

此外，在对以上问题的整体的论述中，作者除了指出“蚩尤与善卷既是远古苗族人民的杰出首领”外，还通过他们率领本族人民长期辗转迁徙生活于黄、济、淮河流域一带而“留在当地的蚩尤遗族，无疑是逐渐融入了炎黄集团并成为后来汉族的成员”这一史实，以论证他们也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民族先民的杰出首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蚩尤可以当之无愧地与炎帝和黄帝并列为华夏民族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祖先。

书中对尧舜与善卷之关系、华夏与三苗之关系的论述也十分精辟。在愉悦的阅读中，作者将读者带到那远古部族集团纷争融合的历史氛围中，从扑朔迷离的重重迷雾中抽象出主要的线条，极有说服力地解读了史籍中关于“舜欲让天下于善卷”的真实情况，以及后世的道家通过善卷的行为所建构的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传统。这些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正博士的序言（见本书《序二》）中已经述及，这里不再赘言。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通过对蚩尤与善卷的解读进而所展现的“从蚩尤到善卷的苗族先民的民族文化精神发展变化的轨迹并以此来观照后世苗族的民族文化精神”。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取向和行为观念的总和，其构成无疑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合体，其内涵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低俗与高贵，进取和保守，温情与冷酷，包容与排斥，敢为天下先与不当出头鸟，以天下为己任与自扫门前雪等等对立的东西，往往彼消此

长共生共存。所以当人们为中华民族优良精神文化传统而倍感自豪的同时，柏杨先生却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给我们兜头一桶冷水，让人不知所从，以致有人对柏杨大加指责，说其迹近于‘卖国’。其实冷静思考一下，文化精神本来就是如此：复杂矛盾，优劣共生。对此用不着大惊小怪，清醒认识才是正理。”作者认为：“蚩尤代表的‘九黎’文化精神和善卷代表的‘三苗’文化精神虽属同一部族文化的范畴，但因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生存环境，因而二者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蚩尤为代表的‘九黎’文化精神与善卷为代表的‘三苗’文化精神作为不同时代、不同生存环境下的部族行为观念的总和，其差异性是一望而知十分明显的。它们二者一是勇于进取、敢于战斗、飒厉逼人、令人生畏、富于英雄气概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这当然与其时蚩尤九黎部族集团本身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具有较强的社会综合实力有关；一是退却、避让、柔弱自敛、为人追逼、但求自我保全的弱者形象，这也与当时善卷三苗集团在蚩尤败后实力大为减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亦相对落后于尧舜华夏集团有关。”“其实，这两种文化精神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它们是一脉相通的两种文化精神。从蚩尤到善卷，从九黎到三苗，尽管表面看来，这个部族集团的文化精神已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但它们骨子里仍是一脉相通的。”

那么什么才是苗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性格特征呢？书中对此有两种解读：

其一是从“两种文化精神的相同内核及其部族命运”也就是“九黎”和“三苗”先后一脉相传之两个部族集团的命运及历史变迁来看其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而抽象出“自我意识强而包容性不足”、“为人师和师人”、“处事爽利果决，拒绝中庸调

和”及“不合则行，不惮迁徙”等民族性格。一言以蔽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蚩尤代表了苗族先民为了生存而顽强斗争的勇敢精神，而善卷则代表了苗族先民为了生存而忍辱负重的谦让精神。谁能说从战略意义上考虑的民族大迁徙以避让直接的部族集团冲突不是另外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进取精神呢？

其二是从作为一个成熟的（苗）民族形成之后所凸现的民族文化精神，这就是“追求自由、敢于斗争的民族文化精神”、“深厚持久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凝聚力”与“追根怀祖的民族文化意识”。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精神，构成了苗民族所具有的巨大民族凝聚力。

人们经常谈到，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良性或者说优秀一面的民族性格中，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的积极精神，其实，这种文化精神在苗族的民族文化精神中更加展现无余。苗族先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不断迁徙，不断地探索新的未知的世界，不断地开辟新的聚居地，不断地对全新的生存环境进行认识、适应和改造，这必须有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拼搏意志、创新的开拓精神和积极的进取意识，高山大川并不能阻碍苗族先民们踏向新世界的脚步，也不能遮挡他们向往和探索新世界的眼睛……这些，都集中反映在蚩尤与善卷的身上，谁能说，后世乃至近现代反映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湖湘人民身上并引以为骄傲的敢为天下先的积极精神，不是一脉相传于此呢？

湖湘文化是近些年来湖南学者比较关注并探讨得较多的一个领域，但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究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种思想文化或者文化精神的概念？是否确实存在着一种具有湖湘大地独特文化内涵的地域文化系统、而不是从属于以湖北境内为活动中心的先楚（荆楚）文化的子系统？湖湘文化的源头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湖湘文化的内涵及

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从湖湘文化的发生及成立史着眼，仅仅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史实中或人物事迹中截取一些为我所用的片段资料或者思想因子敷衍成文，所论既显得单薄，又不能不失之片面，甚至完全难以成立。例如，如果说湖湘文化仅仅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并与其有着同一性，那么当屈原从楚都流放到湖湘大地（具体在沅湘流域）之后，他所面对乃至在他的笔下流淌出来的湖湘文化怎么会展现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景色并使他产生出如此多的创作灵感？实际上，他所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保留着更为原始、更脱离“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灵魂、拷问灵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这种异质文化氛围下的屈原才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精神的超越和升华。无论是从文化史、思想史或者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先秦的屈原都是一个惟一，而这个惟一就是特定的人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合力作用的产物；要知道，在先秦有着类似于屈原身世、遭遇、感受的人不知有多少，但他们都没有成为“屈原”，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这种异质文化环境的浸润和催化。类似的例子还有汉代的贾谊等。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奇异瑰丽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历史上的屈原；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远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湖北为中心的）广义楚文化的异质地域（湖湘）及民族（三苗）文化，而后经过历代民众与思想家的添砖加瓦以及其他地域文化与思想文化的渗透融合而日益丰富以致定型，进而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子以致特色独具的湖湘文化，否则这一历史地域文化就不成其为“湖湘文化”。

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在《善卷、蚩尤与湖湘文化》一章中，作者首先罗列了学术界几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分析了这些观点的局限与不足，例如针对“湖湘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文化”说的观点指出：“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否只到楚文化就打止了？楚文化以上的越文化、三苗文化、舜文化、炎帝文化等也是在古代湖南大地上有着重要表现的古文化，这些文化难道在后来的楚文化、湖湘文化中没有留下丁点儿痕迹和影响么？难道当时的湖南大地是一块沙漠，这些文化留在此地的影响都如水泻沙中一样了无痕迹了么？”针对“湖湘文化起源于北宋的周敦颐”以及将“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当作湖湘文化的源头”，作者指出：“将湖湘文化等同于经世致用思想、等同于少数精英人士的思想学术”，“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怎能仅用经世致用就可概括无遗呢？”“其不妥当是显而易见的”。“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包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等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人民或在湖南生活过的人物（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所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无论是对其进行界定或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人们讨论广义的文化时必然要包括了狭义的内容，同样讨论狭义的文化如果不从广义的文化着眼，这个讨论肯定难以全面深刻。”“文化是复杂的，湖湘文化同样如此。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层次的，既包含了属于意识形态层次的观念文化，也包含了物质形态的物质文化；既包含了上层的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湖湘文化既然是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由生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积累、积淀而形成，它也就必然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是多元融合发展的结果，其源头决不止一个或少数几个。当然，这些源头有长有短，汇入湖湘文化这条浩浩长河中的时间有先有后，汇入的流量也有大有小，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条长河中有着众多支流的成分，它能形成今天这个奔腾浩荡的气象是由于众多支系汇合的结果。……没有众多的支源何来湖湘文化的汪洋恣肆多姿多彩！”这些论述，显示了作者宏大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学术视角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自觉运用，以此而建构的湖湘文化发生、发展与成立史，当然就具有较强说服力，而不能不获得人们的认同。

正是在这一坚实论证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善卷、蚩尤所代表的‘三苗’、‘九黎’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一个源头”；并进而认为：“强悍、坚韧、耐艰苦、不怕死的湖南士风民习”、“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强烈、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的湖湘精神内核”，均可以追溯到“三苗”和“九黎”等远古苗族先民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这一源头。正是如此，汇合着“炎黄文化”、“三苗文化”、“楚文化”乃至宋代以降诸多思想家所建构的思想与精神文化因子的湖湘文化，才会有着钱基博先生所说的“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的“普遍的精神风气”。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湖南士民中这种精神风气当然不是近代才形成的”，而是导源于“九黎”首领蚩尤乃至其后之“三苗”、“苗蛮”诸先民的与天（大自然）奋斗、与人奋斗而“首身离兮心不怨”、“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九歌·国殇》）的顽强拼搏精神，而这恰恰是“与当时中原各国文化相比（而有着巨大

差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湖湘文化这一“独立根性”的渊源之所在，“这种精神风气在近代湖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是在这一层面及这种特质中，体现了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也是近现代湖湘文化予中华民族卓异奉献之所在。作者的这一深入考察和精辟见解，无疑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和研究湖湘文化开辟了思路、拓宽了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还为学术界研究和解读古史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并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作为范弟兄的一位挚友，先睹为快之余拉杂谈了以上一些心得。书中的精辟论述当然远远不止这些，相信读者读后，也会有与我一样的同感。

2003年1月10日谨序于陋舍洗心斋

序 二

刘 正

正值年底，我收到了湖南学者刘范弟先生托友人送来的这部书稿。当时，因为忙于为美国 WHM 哲学与宗教研究院的研究生们开设中国上古史和宗教史课程而赶写英文讲义的我，正为自己英文写作能力的不足又急又恼之时，哪里还有时间和心思“青梅煮酒论诗文”呢？到了午夜时分，终于把我所担当的三门专业课程的英文讲义大纲写定并用邮件发走了。我本想草草翻一下书稿就该休息了。谁料想一看目录，我就先被惊了一下。再看完前几页，我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时间困意全消，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一直读到了天亮。

刘范弟先生的这部专著，以我略为所知的日、英、法、俄、德等国汉学界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善卷的成立史问题进行过哪怕只是一节或一章的研究和论述。在国际汉学界大名鼎鼎的研究中国上古史、思想史、宗教史、神话史等专业的专家学者，如日本的御手洗胜和赤塚忠先生、俄国的 Борис 先生、法国的 Schipper 先生、德国的 Perzynski 先生、美国的 Werner 先生和 Schuessler 先生、英国的 Soothill 先生……把我脑海中有印象的大牌东西方汉学家的名字想了一遍，不知道谁曾对善卷的研究发表过文字。

睡了一上午，下午起床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找家中的

几部权威性的东西方汉学论著研究书目。美国的 Gordon 博士和 Shulman 博士的名著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hina: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1945—1970* 和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China: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1971—1975*，英国的 Lust 博士的名著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法国的 Cordier 博士的五卷本名著 *Bibliotheca Sinica*……果然不出所料，还是没有找到研究善卷的相关论著。我幻想着也许日本每年厚厚的一大本《东洋学研究文献类目》中或许会收有有关论文吧。遗憾的是我自己手中没有，因为从创刊到现在已经出版得太多了，也太厚了，连一般的大学图书馆中都不敢保存。

当然，在国内学术界，单篇的研究和介绍论文，还是间有所见。如何光岳与应国斌先生等人就写过有关善卷的文章，这是不能不提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善卷进行系统而专业化的成立史研究，刘范弟先生当之无愧是第一人。在史料和参考资料极为不足的情况下，刘范弟先生却为我们拿出了这么一部专著，实在是难能可贵！

作者的全部构想可以用这样一个模式来体现，即：

武陵善卷·远古蚩尤·苗族祖先：三位一体。

在读这部书稿之前，我多次从湖南方面的几位著名学者向我作的介绍中知道，作者是位深于古典文献的专家。现在读了此书，我才知道他们所言不为虚谈。

本来，对上古人物的成立史研究是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判断文字记载究竟是神话还是史实之间作出选择，一有不慎，就有可能走上或疑古过甚（把史实也看成神话）或食古太烂（把神话也看成史实）的危险地步。西方学术界以前流行的原型说、文化人类学和所谓的考古人类学、神话考古说等